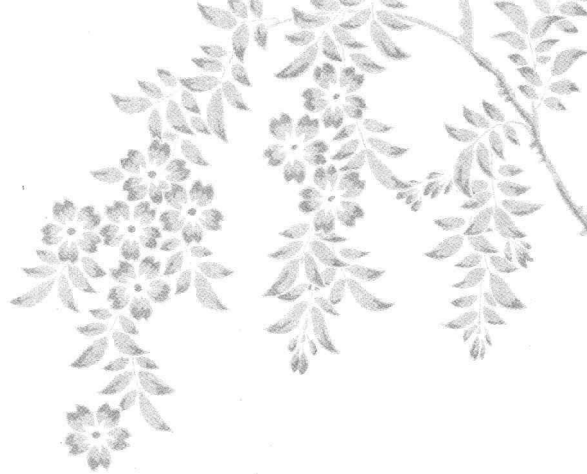


王元化 著



清園自述



清園自述

王元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园自述 / 王元化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 - 7 - 5633 - 3236 - 6

I. 清… II. 王… III. 王元化—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449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策 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郑纳新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9mm × 1 194mm 1/32

印张:7 字数:132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2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出版说明

王元化先生在世的时候,广受学界的尊崇;他去世了,至今令人怀思。一代有一代的学人,元化先生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的代表。他去世了,也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学人的终结。10年前编辑到沪上组稿,得到元化先生的垂顾,以其新作《清园自述》交与我社出版。转眼九年过去,先生去世也已两年多了,面对一天天轻飘起来的时光,我们常有一种难言的苦寂。先生的这本写在人生边上的文字,凝聚了大半个世纪的沉重记忆,至今散发着思想的活力;我们重新阅读,如重聆先生的启教。往事不可重回,先哲不再,但这些思想的光华和人格的魅力,却仍然闪烁在时间的深处,温暖着我们的心灵。这或者不会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感受。因此,我们重版元化先生的这个作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上海)

2010年7月6日

目 录

自述	(1)
寻根江陵	(8)
重返清华园	(21)
台湾一瞥	(28)
一九九一年回忆录	(44)
哈佛燕京之会	(80)
斯城之会	(88)
五四八十年之会	(95)
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109)
读莎剧时期的回顾	(123)
《文心雕龙》的研究	(150)
韦卓民先生	(154)
熊十力先生	(158)
郭绍虞先生	(167)
忆辛劳	(172)

记达君	(181)
记张中晓	(186)
从《展望》到《地下文萃》	(191)
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	(203)
后记	(210)

自 述

学不干时身更贵，
书期供用老弥勤。

——录公严师诗句

我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到目前已有五十六年了。但认真算起来，我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并不多。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使我有好几次不得不放下笔来。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五年，我只写了几篇短文。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到一九七九年末平反，在这二十多年中，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才鼓起勇气记下当时的感受。我并不奢望这些文字将来可以发表，只是为了排遣生活的空虚，想在流逝的岁月中留下一点痕迹。这期间我两次患病，一次在三年灾害时期，因营养不良得了肝炎。一次在“文革”前两年，正是我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进入高潮的时候，突然少年时期所患的静脉周围炎

(眼底回血管出血症)复发了。一天早上醒来,我的右眼一片黑暗,完全看不见了。我对这意外的打击感到恐惧。那时写作是我的惟一寄托,我不能想象眼睛完了我将怎么办。在这愁苦的日子里,我的亲人为我找到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我接受了医生直接在我眼球上的注射,每周一次,一共打了九针。由于疗效不大,剩下的一针就停止不打了。当我从消沉中渐渐振作起来,我还不能使用目力,只有请求父亲帮助。那时他已八十出头了,早已从北京交大退休回来,和母亲住在一起。每天他步行到我家,以极大耐心为我阅读资料、作口述笔录。现在我还保存着他为我誊写的八大本手稿。我的眼病刚刚有所好转,持续十年之久的“文革”发生了。

我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争烽火中度过的,接踵而来的则是运动频仍的严酷岁月。从事研究工作,需要摆脱世事的困扰,无拘无束地进行潜心思考。黑格尔于一八一八年荣膺柏林大学的讲席,他一登上讲台就在开讲词中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使得几乎已经很消沉的哲学也许可以重新发出它的呼声。”(大意)黑格尔说的使精神返回自身那种内心的宁静,不是生活在动荡环境中的人所能享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艰难岁月也使人有可能将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没有经受这种痛苦,没有经受环境施加给人的无从逃避的刺激,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深沉的思考。这是在远离尘寰的书斋中通过苦思

冥想所不能得到的。大概神秘主义者雅科布·伯麦(Jakob Böhme)把“苦闷”(Qual)作为能动的本原就含有这种意思吧。为什么有不少人一旦离开养育他的土地,在尚不熟悉的新生活中过着很少变化的宁静日子,思想反而逐渐枯窘起来呢?恐怕那些曾经使他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的全然消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把环境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作为我们丧失宁静生活的某种补偿,虽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所愿意的。相反,我们却要命运所作的这种安排付出重大的代价。

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太史公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以说是对中国思想史所作的钩玄提要的说明。我以为不能单单列举五四时代那些把学术当成实现某种意图工具的学人,作为维持“救亡压启蒙”这一观点正确性的惟一依据。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思想本身去找寻问题的答案,纵使当时没有救亡的压力,他们也不会做出其他的选择。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这一时期和他们不同的另一些人,如王国维、陈寅恪等,看作只是一些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冬烘学者,殊不知他们对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并不比前面所说的那些人逊色。他们以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宏扬传统,重建中国文化,未始不含有救亡图存的动机,但这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学术研究。

一位友人曾从我的书中摘出这样一些句子:“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

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他认为这些见解不是来源于读书，而是直接来自阅历。这话是不错的。生活经历激发了思考。这些年我所写的谈龚自珍、谈韩非、谈公意、谈道德理想主义、谈杜亚泉，以及对于黑格尔、对于五四等等的反思……也都是在同样情况下进行的理论探讨。在历史和现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的“史家对已往史实的兴趣永远是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这句话最为透彻。但它也包含了一条界限，史家一旦越过这条界限，把对当前生活的关怀变成用历史去影射现在，那么也就使历史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现代关怀是隐含在历史研究之中的，史家本人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我希望读者从这本论学集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历程。我的早期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编第一本集子时，大部分就未收入。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的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从这种模仿中挣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日伪直接统治下的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几乎成了我当时的惟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候在家庭受到宣扬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抗战初，我结识了满涛，他刚从美国经欧洲返国。由

于共同的爱好,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也欣赏他的杂文的犀利。我们对鲁迅精神作了自以为深刻其实不无偏差的理解,以为在论战中愈是写得刻骨铭心、淋漓尽致,也就愈是好文章。偏激情绪对于未经世事磨练、思想不够成熟、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一九五五年,我受到胡风案件的株连,引发心灵上的大震荡,接着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我被允许阅读书籍。这时我完全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我认真地读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逻辑》、《美学》、《哲学史演讲录》三种,成了我熟读的书。仅仅《小逻辑》这部著作,我就读过四次,每次不止读一遍,写了两次笔记,共有十来本练习簿。我沉潜于思辨的海洋,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于令人心醉的激情世界了。

这以后有许多年,我只读那些不容易读懂的书,以为只有这种著作才蕴含深刻的哲理。幸而那时以艰深文浅陋的臆鼎之作,尚不像今天这样弥漫于理论界,而我对它们也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

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直到这两年，当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时，我还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不仅限于对黑格尔本身的再认识，而且也是对五四以来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等既定观念的重新估价。这些观念至今仍作为知人论事的标准，牢牢支配着思想界，成了遮蔽历史真象难以破除的偏见。

我感到，自己没有充分掌握材料并对材料作出仔细的鉴别和考察，是造成误差的原因之一。这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传统的训诂考据问题上去。这方面的思考使我发觉，过去所深信的所谓逻辑和历史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清人钱大昕听说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也就是阐明此义。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始终占据上风，而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据说一位论者准备批“四书”中的儒家思想，竟以为用不着去读原著，只要请人把“四书”中的有关观点罗列出来供他使用就行了。这可以作为上述那种看法的一个实际例子。不必讳言，过去不少训诂考据文章，往往流于琐碎，有的甚至变成了言不及义的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断言训诂考据是无用的，正如不能因为曾出现过大量“假、大、空”的理论文章，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作出高低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不

能抽象对待。对于庄稼来说,下雨好还是晴天好?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定。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观点重要还是考据重要?也属于同类性质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嘲笑莎剧《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的美尼涅斯·哀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荒唐地把人比做他自己身体的一个断片,由一个个体供给其他所有个体以营养。他认为各司不同职能的人是像珊瑚一样,每个个体都供给全体以养料。我觉得,学术工作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手段,其作用虽有大小,但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庄生所谓“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也即阐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这句话隐隐涵有平等与自由的意蕴,是值得细细玩味的。

一九九四年八月记于沪上清园

(录自《清园论学集》序)

寻根江陵

九月二十三日

晴。按事先约定，今日偕清姐同去江陵。上午五时起床。六时乘小吴车去机场。七时二十分准时起飞。八时四十分抵武昌，庐音、嘉年及江陵萧旭副县长、刘耕伐局长来接。下榻珞珈山宾馆。下午三时去武大宿舍探望舅母许海兰。舅母已九十又三，仍健。她与舅父结婚后，来华已久，能说一口湖北话，但此次见面只用英语谈话，而头脑亦不如上次见面时清晰。舅母住庐音家中。我们去时，庐音与车锐、稀恩与秉兰、嘉年与王仁卉及第三代桂钢、车音及嘉年之女均在，济济一堂，十分热闹。第三代中除车音外，其他尚初次见面。我和他们都谈了话，直到九时始尽兴返珞珈山宾馆。

九月二十四日

晴。江陵开来两部小车供我们乘用。早上七时许起程，自汉阳上高速公路，入荆州地区。经仙桃、潜山、丫角，其中有

一处地名蓼山(蓼读若渣,裂开也。小时候家里人称布鞋裂开即云蓼开)。高速公路长一百五十多公里,可惜只有中间一段,再前进仍转入普通公路。据云二年后高速公路可直达宜昌。抵江陵下榻县招待所。黄发恭县长、萧旭副县长等已在招待所迎候。中午萧副县长等设宴招待,晚则由余世先副书记招待晚餐。饭后,黄、吴县长来访。江陵乃祖辈生养之地。我在北京长大,从未到过祖籍,此次来到故土,不免思绪起伏,深夜仍难以入寐。甫入睡即醒转。前些时为撰写《杜集序》夜夜服安眠药未断。今夜睁眼躺在床上,又有蚊虫来扰,只得起床开空调以驱蚊。

九月二十五日

晴。早黄县长在会议室讲述江陵建设情况,萧、吴、余、刘诸位亦在座。闲谈中,有人说到江陵干部不会宣传,附近有些县在这方面比较擅长,所以江陵从未被评为模范县或先进县。但有一年闹饥荒,独江陵无粮荒,附近被称为先进县的乡民纷纷来到江陵就食。下午吴、余二位副县长陪同去江陵图书馆参观。门前“江陵图书馆”五个字为我所书写。我捐赠图书馆的书已近三千部,在馆内专辟一室存放。晚,武汉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李建中、荆州师专中文系白少玉及地方志编辑部一同志来访。

九月二十六日

晴。上午李家栋副书记偕经委陈主任陪同参观果糖浆

厂、纺织厂、马河水厂等处。谈到荆州的纺织工业，想起母亲常夸荆州缎如何精良，小时候我们家所用的被窝就是以荆州缎作为被面。母亲也常常讲起荆州妇女多在纺织厂做工，可见清末这一带纺织工业已很发达。马河水厂是江陵引为骄傲的地方。占地颇大，江陵人把水厂建成像一座园林，花草树木，琳琅满目。身入其境，不知这座花园中竟隐藏着一个自来水厂。午后，参观博物馆，博物馆是宫殿式建筑，覆盖着蓝色琉璃瓦屋顶、灰白色的西式房屋，颇像我小时在北京所见到的燕京大学的建筑格式。原来馆藏的吴王戈、越王剑已调京，没有见到。馆中有一具西汉出土的男尸，密封于地下用水泥制成的墓穴中，上覆以厚玻璃砖露出地面，可供人参观。据说尸身出土时尚有弹性，但因浸泡在红色药液中过久，毛发皆落。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具男尸比马王堆出土的那具女尸要早一百多年。博物馆中还有一项名贵的陈列品，也是极罕见的，这就是薄如蝉翼的丝织品残片，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现代纺织工艺已无法制成这样又轻又薄的丝绸。讲解员最后把我们引进博物馆的一个小礼堂去看楚乐表演。幕拉开后，台上穿着楚国服装的十来个演员分掌自己的乐器，编钟、风鼓等等，一起演奏起来。我不懂音律，很难说出这些拟作的楚乐有多少成分保持了原来面目。楚乐奏罢，忽然演奏了一首外国歌曲 Long Long Ago。在这场合演奏一首洋歌，我实在感到有些惊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县领导，认为在楚乐中夹杂洋歌不妥。但博物馆归地区管，也许县里说不上话。

九月二十七日

晴。到江陵后我仍按平日习惯早起作户外散步。上午参观八岭山墓葬群。先到了辽简王墓，地处荒山中，规模甚大。辽简王为明永乐弟，名朱植。墓地甬道直通停棺处，棺槨仍在，朱植大概在此地被封王，其历史不详，一时难寻史书核查。楚国建都于郢达四百余年，江陵即郢故地，名纪南城。在墓葬群不远有纪南城故址石碑，碑文为郭沫若书写。这个昔日的城廓，今已成为桑田。田野中隆起一道土坡，陪同者指给我们看说，这就是郢都城垣遗址。八岭山墓葬群建有高数层的木架瞭望台，登上眺望，大小坟墓连绵不绝，尽收眼底。陪同参观的萧副县长指着不远地方的一个直径约三四丈、上面长着青草的土丘说，这就是楚庄王之墓。据说有三十多个楚王埋葬在此，其中庄王墓最大，他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国在他那时候也最强盛。此地既是楚国的陵园，地下埋藏的文物一定非常丰富。县里的领导曾向我说，发掘出来的楚国漆器几乎可堆积成山。他们曾向中央有关部门请示，要求将多余漆器出口，换取外汇搞建设，但没有被批准。这么多出土的漆器由于无法好好保存，不少已在腐烂。中国的确是一个文物大国，地下埋藏极丰，掘地即可见宝。仅以出土的汉简而论，许多地方博物馆也像荆州博物馆一样，面临无法保存的困难。汉简如龟甲、钟鼎、帛书这些出土文物一样，是中国文化的重大财富，可补文献之缺，可订史书之讹。由于各地博物馆多采取地方保护政策，不愿外人插手整理，而仅靠本身十分有限的力量，又无法做成。于是大批汉简堆放在那里（有的甚至是泥地